

余英时文集

第六卷

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



余英时文集

第六卷

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

余英时 著 沈志佳 编

Minzhu Zhidu yu Jindai Wenming

责任编辑：吴晓妮 赵艳 孟建升
封面设计：刘凛
版式设计：陆润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 余英时著；沈志佳编. —2 版.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余英时文集；6)
ISBN 978-7-5495-5295-5

I. ①民… II. ①余…②沈… III. ①民主—文集
IV. ①D0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777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524002)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6.125 字数：40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2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4 000 册 定价：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余英时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即将面世，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友人沈志佳博士通力合作的最新成果，让我首先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必须赶紧补充一句，对于志佳而言，这“感谢”二字是绝对不够用的。像前十卷一样，从集结到编定，她为这两卷文集做了无数劳心而又劳力的细致工作，她在《编者后记》中已透露此中消息。

最使我感动不安的，志佳自己的职务一向很繁重，接掌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务以后，更是如此。但是十几年来，她竟在繁忙的专业之外，硬挤出时间来，先后为我编出了十二册文集。由于志佳和我是史学界的同行，她编我的文集无论是主题的选择、分类，或系年等方面，都井然有序。因此我的作品才能够以系统性的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得到这样一位富于“理解之同情”的编者，我当然感到十分欣幸，但每一念及她的辛苦和牺牲，则又不胜其惶悚。

《文集》第十一、十二两卷的重点各有不同，《编者后记》已予指出，这里不必重复。这部文集的最早四卷是2004年出版的，十卷本（第五至第十卷）则是2006年出版的，距今已整整七年。现在第十一、十二卷的刊行可以说是承先启后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此中原因并不难寻找：志佳

一直在收集我最近七年来的新作；她将这些新作和以前未收但性质相近的旧作聚拢在一起，新的文集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志佳告诉我：她对于第十二卷以下已有初步构想，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拭目以待。

这部文集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论题繁多，初看似乎有泛滥无归之势。因此我想简单地概括一下我的治学宗旨，以供新一代读者参考。

上接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议，我采取了下面的假定：我承认人类文化大同小异。因为“大同”所以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通，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也可以相通。但因为“小异”，所以每一文化又各有其特色。文化特色复和文化程度成正比，文化越高，则特色也越显著，目前讨论得很热烈的古代“轴心文明”(Axial Civilizations)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史例。在这一假定之下，我的历史研究自始即以探求中国的文化特色为最后归宿。由于文化特色无所不在，不是仅从思想或哲学一端所能掌握得住，因此我在思想之外，还要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去查看这一特色是如何体现的。但我并不把各部门完全分开讨论，而是从整体的(holistic)观点查其互相之间的关联与会通，因为文化特色往往在此关联与会通之处显现。

又由于文化特色并非一成不变之物，而必然在历史流程中逐步演变，因此我的研究也不能限于任何一个时代。大体上说，我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

上面提到，我对于中国文化特色的探求直接导源于五四以来的文化争论。这就是说，如多数现代的中国学人一样，我的文化关怀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究竟应该怎样自我调整和自我转化，然后才能达到陈寅恪先生所向往的境地，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我深信文化之“大同”，因此对五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两大普世价值始终抱着坦然接受的态度，至今未变。但是对于很多五四知识人一方面将“科学”推至“科学主义”(scientism)的极

端,另一方面又将清末以来“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若神圣”(邓实[1877—1951]语)的态度发展到顶峰,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所以追溯到最后,我试图在传统的方方面面发掘中国文化的特色,除了历史求真之外,同时也希望脱出上述两种偏颇,而寻求一条比较顺适的中西文化会通之道。

相应与这一文化关怀,我的阅读和思考范围往往不能不越出我的教研专业,即19世纪以前的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了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我有时也必须引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因为文化特色只有在互相对比中才能清晰地显现出来。为了展示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危机,我甚至不能不把我的史学研究扩展到20世纪。

以上概括只是提醒读者,我的文集虽不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一气呵成之作,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预设(assumptions)、中心观念和价值关怀,可以把一部分散篇文字有机地联系起来,包括第十一、十二两卷的文字在内。有心的读者试一披寻,当可自得之。

余英时

2013年10月27日于普林斯顿

原
序
一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费心费力编成的。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别类，重新编排。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先后也很费周章。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20世纪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可见这一切治学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很明显的，通过当时日本史学界关于“东洋史”的研究，他已接

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欧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这篇论文是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学》一文同样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基本概念而言，他确实拓开了中国史研究的眼界，其贡献是很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却在无意中把“西方中心论”带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欧洲史分期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使许多中国新史家都相信西方史的发展形态具有普世的意义。以西方史为典型，中国史直到清末都未脱出“中古史时代”，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便明白承认：“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见第二编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现代中、西之异主要是两个文明体系之异，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中古”与“近代”之别。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化（如西方）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我十分不赞成“削足适履”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变作一种历史通则，应用于俄国史的研究上面。这一强烈抗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学论著，虽然写作的时间有迟有早，大体上都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的。我诚恳地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余英时

2004年3月21日

原序二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博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史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

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余英时

2006年元旦

目 录

第六卷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民主制度的发展

- 3 第一章 民主的形式与内容
- 12 第二章 希腊首创的民主制度
- 29 第三章 罗马政府的民主因素
- 44 第四章 中古代议民主的发轫
- 55 第五章 中古的民主思想
- 63 第六章 宗教革命与民主的发展
- 72 第七章 专制时代民主的表现
- 86 第八章 民主思想与法国革命
- 98 第九章 19世纪的民主运动
- 113 第十章 近代的直接民主
- 124 第十一章 民主的新方向
- 139 第十二章 民主的批判与展望
- 148 参考书目

近代文明的新趋势

- 151 自序
- 153 第一章 导论
- 159 第二章 新文化的启蒙(上)
——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
- 169 第三章 新文化的启蒙(下)
——宗教革命(The Reformation)
- 182 第四章 自由经济的兴起
——资本主义的发展
- 197 第五章 民主政治的胜利
——从近代国家的凝成到民主革命
- 215 第六章 平等社会的创建
——近代阶级制度的演进
- 225 第七章 帝国主义时代
——极权主义的根源及其萌芽
- 236 第八章 近代文明的新趋势
——19世纪以来的民主发展
- 259 附录 《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重版识语

民主革命论

- 263 建立新的革命精神!(代序)
- 上篇 革命与反革命
- 270 第一章 论革命

279	第二章 论反革命
294	第三章 近代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
	中篇 革命的范畴
301	第四章 论政治革命
311	第五章 论经济革命
320	第六章 论文化革命
327	第七章 论社会革命
341	第八章 论民族革命
	下篇 革命之路
350	第九章 论革命的路线
358	第十章 论革命的方法
365	第十一章 论革命的领导权
371	第十二章 论革命势力的成长
380	附录 西方历代思想家的革命观
385	后记

自由与平等之间

389	自序
392	第一章 自由探本
409	第二章 社会自由及其实现
426	第三章 平等概念的检讨
439	第四章 平等的社会含义

452 第五章 自由与平等关系的探讨

469 第六章 自由与平等的文化基础

482 附录 罗素论自由

497 编者后记 / 沈志佳

民主制度的发展

第一章 民主的形式与内容

人类历史上思想的分野与斗争从未有像今日这样的尖锐化。因为有了这种严重的对立，所以今日就显然的有了两个世界，一个属于自由，另一个属于奴役。在自由的领域中，一切思想可以共存，各种党派可以并立；英美不乏提倡共产主义的人士，不禁止共党组织存在，哈佛大学且坚持不肯解聘左倾的教授，这几件事都是维护自由的铁证。在奴役的领域中，只许有一种思想与一个政党，不接受这唯一政党的领导便被列为思想搞不通的人物，为反动派，便要遭受清算和斗争；铁幕国家绝不许高谈民主自由，绝不能于一党之外另立政党，这也都是些不可否认的事实。从这些事实看来，我们用不着再从事哪个是民主与哪个是反民主的争辩。乃反民主的一方却反诬真正的民主世界为不民主，且自诩为进步的民主，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欺世盗名。其实，民主自有其客观的标准与悠久的历史，终不能为反宣传所遮盖。在这一章中，作者要先说明民主的意义。

民主的意义是什么？过去写书和写文章的人发表过不少的意见。从理论的探讨来讲，有许多哲学的、政治的与历史的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已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不过很少有人以斩钉截铁的说法把民主的意义说得清清楚楚，使人一读了然。我们不能希望读这